

# 略论阿里·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贡献<sup>①</sup>

王泽壮

**摘 要:** 阿里·沙里亚蒂是伊斯兰革命三大著名理论家之一和“游击队之父”。从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史来看,他在继承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改革思想的基础上,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等西方现代思想,并以此来解读和批判伊斯兰教,对当代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启示和影响。本文通过对比沙里亚蒂与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进而认为,沙里亚蒂是在百余年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史上继两者之后最为重要的思想家,他对伊斯兰现代主义作出了多方面贡献。

**关键词:** 阿里·沙里亚蒂思想; 伊斯兰现代主义; 阿富汗尼; 艾克巴尔; 伊斯兰思潮

**作者简介:** 王泽壮, 博士, 山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山西临汾 041004)。

**文章编号:** 1673-5161(2009)06-0071-07

**中图分类号:** G371

**文献标识码:** A

## 一、沙里亚蒂其人及其主要思想

沙里亚蒂(Ali Shariati)于1933年11月生于伊朗呼罗珊省,其身兼注经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父亲不仅亲自推动了伊斯兰思想领袖、印度诗人艾克巴尔代表作《自我秘密》在伊朗的翻译和出版,而且还领导并参与组建伊朗近代史上第一个伊斯兰社会主义性质的学术组织和政党:“马什哈德伊斯兰真理宣传中心”(1947年)和“有神论者社会主义运动组织”(1954年)。摩萨台政府被推翻后,其父还担任摩萨台支持者成立的秘密政党“民族抵抗阵线”马什哈德地方支部负责人。这一切都给年轻的沙里亚蒂留下了深刻印象,称父亲是他的“第一个真正启蒙导师”<sup>[1]</sup>。1955年,沙里亚蒂考取马什哈德大学文学系,并于1959年留学法国索尔邦大学,获博士学位。因在留法期间参与海外伊朗学生运动,沙里亚蒂1963年底回国伊始即遭逮捕,虽1964年受聘于马什哈德大学,但1969年因反政府言论第二次被捕。1969年起,沙里亚蒂主要担任伊朗最著名的民间学术研究机构德黑兰“侯赛因宣教堂”主讲,1973年8月,他因“煽动危害和颠覆政府罪”第三次被捕。1977年4月,沙里亚蒂秘密出逃英国,两个月后猝死于伦敦郊区,享年44岁。沙里亚蒂一

<sup>①</sup> 为纪念沙里亚蒂去世30周年和伊斯兰革命30周年,伊朗和西方学术界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举行一系列纪念活动。2007年7月,沙里亚蒂生前所在的德黑兰侯赛因宣教堂首次举办“沙里亚蒂国际研讨会”;2008年初,伊朗驻华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邀请中国各界人士300多人与会;美国著名的伊朗专家Nikki Keddie和Ervand Abrahamian分别出版“伊朗当代史”,以示纪念。沙里亚蒂虽在伊朗、伊斯兰世界和西方声名远播,但中国中东学界似乎对其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介绍和论述沙里亚蒂的文章,早有冀开运教授的《伊朗青年学生的伊斯兰革命理论家——阿里·沙里亚蒂》(《西亚非洲》1997年第6期),中有王宇洁博士《阿里·沙里亚提的宗教政治思想》(《伊朗伊斯兰教史》,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0~135页),今有笔者的《阿里·沙里亚蒂思想研究》(南京大学2008年博士论文,未刊)。除此之外,据笔者查实,皆语焉不详,甚至常有遗漏。本文既为抛砖引玉,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上伊斯兰革命系列学术纪念活动之回应。文中引用而未注明出处沙里亚蒂文章,均来自www.shariati.com网站,该网站为阿里·沙里亚蒂之子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合办的官方网站。

生进行了大量思想复杂、主题广泛的演讲和讲座，其整理文字稿构成了他波斯文 32 卷选集的绝大部分。沙里亚蒂凭借其博学、口才和勇敢精神赢得人们特别是青年人的狂热追捧，其演讲稿和霍梅尼录音带成为伊斯兰革命最重要的宣传工具。作为伊斯兰革命三大理论家之一，沙里亚蒂用混合着“本土文化和西方知识，糅合着现代思想和传统伊斯兰价值”的激进革命理论作为批判和颠覆巴列维王朝的语言武器，对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从而赢得“游击队之父”的名声。霍梅尼接受意大利记者拉法齐采访时曾说：“阿里·沙里亚蒂对革命作出过贡献。”<sup>①</sup>伊斯兰共和党第一任主席贝赫什提也曾说过：“伊斯兰革命的成功有三大支柱：伊玛目霍梅尼、阿里·沙里亚蒂和‘穆加黑丁’组织。”<sup>②</sup>沙里亚蒂的作品至今仍有大量读者。笔者一位 20 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伊朗出生的工科大学毕业生朋友指出：沙里亚蒂的作品今天仍是伊朗大学生的必读书，尽管政府对沙里亚蒂的思想有选择地肯定，但沙里亚蒂及其作品在伊朗仍广受欢迎，对政府而言，代表着“非官方的价值符号”<sup>③</sup>。随着伊斯兰革命冲击波以及西方所担心的“政治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的崛起，沙里亚蒂作品跨越国界，受到伊斯兰世界的广泛重视，也引起西方学者的再度关注，其作品几乎被译成各种文字，“世界各角落都有他的热情读者”<sup>[2]304</sup>。

沙里亚蒂的思想非常复杂，有时因言论环境而相当模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政治上，未来的伊斯兰社会实行“指导下的民主”。沙里亚蒂对西方民主制度持矛盾态度：既承认西方民主价值又怀疑西方民主制度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的虚伪性，强调伊斯兰伊朗的“社会条件”和“国情”的特殊性。他认为，普通人民蒙昧无知，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因此适合一套“指导下的民主”，即具有进步思想、无私品质和“先锋队”性质的“启蒙知识分子”来推动社会进步。<sup>[3] 24</sup>沙里亚蒂进而提出“启蒙知识分子”的“六大使命”<sup>[3]25-26</sup>。在对西方的态度上，他反对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以“工业化”或“现代性”等旗号所进行的“破坏”和“同化”作用，强调民族文化和伊斯兰教对西方的“屏障作用”<sup>[3]30-33</sup>。在经济上，他倡导建立“以生产资料人民所有制为基础的、人人平等的社会经济制度”，消灭“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在保证社会成员一律平等基础上的经济关系。<sup>[4]119-120</sup>沙里亚蒂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第三条道路”（他称之为“伊斯兰中间派”）理论上。在社会思想上，沙里亚蒂通过定义“乌玛”来勾勒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即以公正为基础的人人平均分配的经济制度，共同拥有社会财富，人与人之间相互平等的社会<sup>[4]119-120</sup>，是一个没有“君主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没有“反动的、堕落的宗教制度”，也没有“统治阶级的政客和贵族”的人人平等的社会。他认为，伊斯兰社会在文化属性上属“宗教社会”，在历史发展阶段上属“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前期”的“13、14 世纪”，“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人民普遍生活在“宗教蒙昧主义”之中，“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宗教麻痹”三者结合在一起的现状之中。<sup>[4]103</sup>为改变伊斯兰社会的落后现状，他号召伊斯兰社会的“自由知识分子”掀起一场“伊斯兰文艺复兴运动”或“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把“人的自由意志”和“创制权”从宗教领袖的手中解放出来。<sup>[4]104</sup>沙里亚蒂的思想主要特点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价值诉求，这同样也是对伊斯兰现代主义早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 二、阿里·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继承

沙里亚蒂曾说：“我们这个死气沉沉的反动社会正缺少像艾克巴尔和阿富汗尼这样的改革

① 此内容可参见：Vanessa Martin, *Book Review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 African Studies*, London: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62.No.3. (1999), p.559., 即 1983 年霍梅尼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齐采访以及 1977 年蒙塔哈里与霍梅尼在伊拉克纳贾夫谈话。

② “穆加黑丁”组织机关报《自由战士》第 139 期，转引自 Ervand Abrahamian, *The Radical Islam: The Iranian Mojahedin*, I.B.Tauris 1989, p.170.

③ 根据笔者与 Muhammad Bakhtiyari 电子邮件。

家。”<sup>[5]</sup>沙里亚蒂在多方面继承和延续了他们的思想传统。

第一，对宗教改革态度上，阿富汗尼极力主张伊斯兰教改革，呼唤伊斯兰复兴，号召伊斯兰民族的觉醒，反对一切僵化、保守的宗教弊端，同时捍卫《古兰经》的最高尊严，“原本的伊斯兰教中，没有消极和屈从，它的真谛是理性、科学、积极进取、爱国主义，是伊斯兰世界独立和抵抗外来侵略与渗透的力量源泉。他总是相信，伊斯兰教现代化是必须的，但同样，对伊斯兰的坚定信仰也是现代化所必须的。”<sup>[6]309</sup>艾克巴尔则从欧洲现代哲学重新审视伊斯兰教，认为伊斯兰教是“一种道德的、精神的、理想的和优越的信念”，也论证了“伊斯兰教一直与科学处于和睦状态之中，事实上，它为中世纪科学精神的发展直接尽到了责任”，近代伊斯兰思想衰落的原因是外来思想的侵入造成的“消极遁世思想迷惑了穆斯林大众的心灵，使他们在信仰上误入迷途而无力自拔”。他号召伊斯兰世界应以深刻的思考和全新的体验勇敢继续目前的改革和复兴，“亚洲邻国的改革新经济试验使我们看到伊斯兰的内在意义和命运”，造成今天落后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伊斯兰丧失了前进的动力。<sup>[7]147</sup>沙里亚蒂提出，今日伊斯兰已经沦为“保守”、“落后”且“敌视西方进步文明”的“宗教形式主义”和“宗教教条主义”，从“革命”、“进步”伊斯兰蜕变成“萨法维的”、“安于现状的”、“维护个人利益的”、并与“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一起构成了统治人民的“三位体”和“统治者本身”，是伊斯兰社会落后的内部总根源，“社会主义的”、“保障个人自由的”、“革命的”、“进步的”、“平等和正义的早期伊斯兰”的丧失是一切社会落后、精神堕落、政治专制、经济剥削和宗教麻痹的罪魁祸首，对“穆斯林社会一切弊病”“负全部责任”<sup>[8]</sup>，伊斯兰教必须要来一次欧洲式的“宗教改革运动。”<sup>[3]24</sup>

第二，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上，阿富汗尼认为，“外来的异端邪说渗入了伊斯兰教，造成了不利影响”，“坚决主张吸收西方的科学文化，使伊斯兰适应社会经济条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并复兴伊斯兰教”，西方掠夺成性，“道德上腐败、堕落”，总之，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应该学习、吸收，而西方价值观则应予以拒斥。<sup>[6]314</sup>艾克巴尔用诗歌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批判：“欧洲文明已经站在坟墓的边缘，它岂能使伊朗和阿拉伯复活。欧洲文明是对心和眼的猥亵，因为它的灵魂已经不纯。”<sup>[7]128-129</sup>艾克巴尔鄙弃西方价值观，认为西方人金钱高于一切，他们的上帝是金光闪闪的金属，“西方人将生命置于实用理智之上，东方人在爱中寻找创造的神功。而精明者需要爱的力量？”在艾克巴尔的眼里，这些西方人已经被个人主义折磨得对生命产生了“厌倦”，“请相信我，今日的欧洲是人类道德进步上的最大障碍”，但对于西方科技，则必须学习和吸收。<sup>[9]108-109</sup>沙里亚蒂也对西方科技和文化成就完全持肯定和赞扬的态度，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整体上表现出拒斥的立场，他说：“当殖民主义进入新阶段，把手伸到亚洲时，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在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名义下破坏各大宗教。”<sup>[3]30-33</sup>

第三，对宗教的“屏障功能”上，阿富汗尼认为，以伊斯兰教为精神支柱的伊斯兰世界处于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伊斯兰国家实行改革是保存伊斯兰教的当务之急，改革目的是唤醒“穆斯林民族反对西方侵略”。他相信伊斯兰教本身具备抵御西方殖民主义的政治能力，宗教改革的目的是复兴和保存宗教，一个有活力的宗教可有效抵御西方对穆斯林社会的征服和破坏。<sup>[6]308</sup>艾克巴尔则试图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高度重新解释、补充和修正伊斯兰文化传统，包括宇宙观、本体论、知识论和全部信仰体系，达到“重建”伊斯兰宗教思想的目的，以适应时代需要，跟上时代步伐，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摆脱落后和被动局面，再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sup>[7]167</sup>而沙里亚蒂则从民族文化的存亡高度认识到宗教具有抵御外来文化入侵的“屏障功能”。“历史经验已让殖民者得出教训：当面对外来者时，宗教是赋予一个社会强化认同、自立、信念和独立的最强大因素。”<sup>[3]31</sup>

第四，在弘扬“创制”（“独立判断”）问题上，三人是一致的。阿富汗尼曾指出，“创制”是每个民族进化、跟上时代变化和发展的必须行为。<sup>[6]314</sup>艾克巴尔认为，“创制”是先知与神秘主义的主要区别，“‘创制’是伊斯兰文化的灵魂”，理性的出现是人类的进步，使人类可以控制环境，完善自己，伊斯兰教的诞生就是“创制”的结果。他认为，伊斯兰思想最近几百年的落后和停滞

不前，就是因为“创制”的丧失，即忽视理性在认识和改造世界方面的作用。<sup>[7]174</sup>而沙里亚蒂对“创制”的重新解释则更具革命性，即“创制”不仅对时代进步有必要性，而且是“每个有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人的权力”，把“创制权”彻底下放到每个“进步的”穆斯林手中，即使是文盲，只要他有“社会意识”和“责任感”，便拥有“创制权”，“在法制、经济和社会领域内应用自由‘创制’，是宗教现代化和社会现代化两个过程同时进行的可靠保证，只有社会生产领域作为经济基础发生变化，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才有可能发生变化。”他甚至把“创制”的意义提高到关系伊斯兰生死存亡的高度。<sup>[10]88</sup>

另外，在对下层人民的同情意识、对一切不平等现象的批判态度、积极介入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现实责任感、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开放心态与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对保守的宗教人士与一味模仿西方的厌弃和鞭挞等问题上，三人都表现出惊人的外在相似性或内在一致性。尤其三人均无一例外肯定、宣扬和歌颂暴力和“殉道”对于反抗“社会不正义”的作用和意义，号召穆斯林采用暴力手段铲除社会不公、腐败统治和“邪恶”现状。总之，从阿富汗尼到沙里亚蒂，其间虽相隔一个多世纪，但伊斯兰现代主义精神和传统仍在 20 世纪后半期的沙里亚蒂身上得以传承。

### 三、阿里·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发展

作为特定时代和思想环境的产物，沙里亚蒂在这些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的基础上，又大大推进了一步。

第一，对伊斯兰教传统概念和观点进行“颠覆性”的理解，使之变成有明确指向的革命意识形态，而不只对伊斯兰教本身进行改革。他对传统的宗教概念“创制”、“掩饰”（“塔齐亚”）、“效仿”（服从、“塔齐里德”）、“渴望”（恩塔泽）、“吉哈德”（圣战）和“迁徙”（“希吉拉”或“徙志”）等完全根据自身理解给予重新解释，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两分法，把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分为“萨法维什叶派”和“阿里什叶派”，把造成近代落后局面的责任完全归罪于那些“萨法维教士”，认为今日“萨法维教士”已患有两种“癌症”——“宿命主义”和“滥用宗教权威”：“宿命主义”口喊伊斯兰，手捧《古兰经》，但对现实问题已丧失“过问”和“议论”的“胆量和信心”，认为只管读好《古兰经》；而“滥用宗教权威”的“萨法维教士”则用“假知识”和“假虔诚”来蒙骗无知群众，尤其“毒害”了一代穆斯林青年。<sup>[11]</sup>沙里亚蒂给这些保守的“萨法维教士”罗列了一系列罪名，指出，“别指望这样的人能给社会带来进步。”他从马克思主义中吸收了“历史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法”，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在矛盾发展中逐渐展开、并通向一个更高级社会阶段的所谓“科学决定论”史观——“历史过程就是在辩证运动过程中，通过矛盾运动展开的过程。整个历史上存在的所有社会，无论从民族的和政治的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来理解，都是建立在矛盾之上的。”<sup>[4]118</sup>沙里亚蒂认为，人类历史从一开始就表现为代表更先进“农业经济”和“压迫者”的“该隐阶级”对代表落后“游牧经济”的“被压迫者”的“亚伯阶级”的胜利。他从马西格农那里借用“辩证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对伊斯兰社会的经济结构、现状和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和定位，认为今日穆斯林社会虽与欧洲同处 20 世纪，但其社会经济结构、社会发展状态和人民素质还处于欧洲 13 和 14 世纪的水平。因此，穆斯林社会要想摆脱经济落后、实现国家富强，不仅要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掠夺和压迫，更要从思想上在穆斯林社会掀起一场类似欧洲的“伊斯兰文艺复兴运动”和“伊斯兰清教运动”。<sup>[13]102</sup>知识分子要抛弃“萨法维什叶派”安于现状、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宗教形式主义”和“宗教教条主义”，要充分掌握西方科技并对社会现实有强烈“责任感”和“勇于献身的无私品格”，这样才能充当“领导社会进步”的领路人。<sup>[5]</sup>他对伊斯兰理想社会“乌玛”进行了全新勾画，其社会制度是“以公正为基础的人人平均分配”制度，共同拥有社会财富，消除财产分化，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的平等社会，在政治上实现“指导下的民主”<sup>[4]119-120</sup>；国际上，与一切被压迫和受掠夺的第三世界人民结成反殖反帝同盟。<sup>[14]</sup>总

之，沙里亚蒂构建了一套“伊斯兰意识形态”，从对传统宗教和文化的改造到继承，从政治制度到经济分配，从内政到外交，从“人的改造”到社会改造，都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和设想。

第二，把西方新思想——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和“阶级分析法”，有选择地吸收并糅进伊斯兰，赋之以新内容。西方存在主义哲学主张直接影响了沙里亚蒂对生存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自我选择，更影响了他的历史观、人性观及许多重要理论问题的解读。他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认为人有充分的选择自由，能够限制“人的自由意志”的外部因素只有“死亡的不可避免性”和“衣食住行以及与此相关的生理必需”。此外，人有做出自我选择的绝对自由，对自己的选择也因之负有绝对责任。<sup>[15]134</sup>他从伊斯兰教对“人”的传统理解出发——把人视为二维度的（Two-dimensional）人，既有低贱和邪恶也有神性和崇高的一面，人的一生就是从低贱走向崇高的过程，即逐渐接近完美过程，而在此过程中，人要面临无数选择和决定以及无数个“自由意志”发挥作用的时刻，该过程既是“个人选择”对社会产生影响和作用的时刻，也是个人修炼和完美的宗教过程，进而得出伊斯兰教所强调的“两世兼重”就是此生重视“自由意志”的发挥和“个人行为的选择”，然后才能得到来世完美这一结论。<sup>[13]71</sup>从“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选择”的存在主义观念出发，沙里亚蒂还得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实质是当时欧洲“启蒙知识分子”（“自由思想家”）利用宗教中对人的平等观念的强调和“宗教反宗教”才得以完成这一结论。<sup>[3]23</sup>对于马克思主义，沙里亚蒂在总体上持相当肯定态度，他在作品中多次以肯定和仰慕的口吻称赞马克思是西方社会的“高明医生”<sup>[13]115</sup>，对下层人民“高度同情和了解”<sup>[16]</sup>，是“包括思想专制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专制制度的敌人”<sup>[3]45</sup>，是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思想导师”<sup>[3]45</sup>。更重要的是，他以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为工具来分析和研究伊朗和穆斯林社会历史，从而得出一系列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和“西方化的”知识分子的结论，如“宗教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总是与统治阶级结成同盟，成为统治集团麻痹人民的工具”，“宗教为统治阶级所利用，是由其阶级属性所决定”的全新结论，这是沙里亚蒂之前的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从未有过的结论。<sup>[4]118</sup>

第三，对传统宗教、宗教制度和教士的批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与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这些伊斯兰宗教改革家一样，沙里亚蒂对传统宗教的“保守和僵化”、对“教士堕落和麻木”进行了猛烈批判。在早期批判中，他只笼统地把穆斯林社会的落后和今日衰局归结于保守教士。他在名为《萨法维什叶派和阿里什叶派》的演讲中批判教士把自己出卖给统治阶级，把伊斯兰事业变成了国教，把伊斯兰经典当成“枯燥无味的羊皮纸”，只对“那些鸡毛蒜皮的衣着、礼节、胡子养多长着迷”，用“宗教文本作为逃避现实问题、特别是工业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重大问题的世外桃源”，根本不理解伊斯兰中一些重要术语如“乌玛”、“伊玛目国家”（Imamate）和“真主独一”到底什么意思。<sup>[12]</sup>沙里亚蒂指责教士是“宿命论者”，完全错误地理解卡尔巴拉<sup>①</sup>的真正意义，目光不是向前看，而是一心沉迷辉煌的过去，对西方进步思想一无所知，把西方思想包括进步思想都拒绝得干干净净，不了解和忽视伊斯兰改革者阿富汗尼和艾克巴尔对伊斯兰文化的价值和贡献。沙里亚蒂还指责教士为支持和维护君主专制制度，与宪政革命时代的某些教士做法一样，甚至不惜歪曲伊斯兰教法。<sup>[5]</sup>

沙里亚蒂特别指出，教士们为建立一个教士专制制度（Clerical Despotism），妄图垄断伊斯兰教的解释权，即独霸伊斯兰解释的“话语权”。这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最具压迫性的专制形式，因为他们把宗教经典秘而不宣，或故弄玄虚，让一般人难以理解，又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宗教解释，这样就会以“维护宗教、打击异端为借口”把“‘创制’大门重新关闭。”<sup>[13]104</sup>沙里亚蒂还指出，教士们把“宗教上的引导”解释为“盲目服从”，实际上人为地把伊斯兰划分为两种不同性质的伊斯兰——一种是以“宗教知识为根据的、反动的、宗教领袖的伊斯兰”，另一种是以“信仰为基础的、革命的、自由战士的伊斯兰”<sup>[17]</sup>。他在《宗教反对宗教》的演讲中宣布，由于教士

① 伊玛目侯赛因与亚兹德交战而死的地方，是什叶派穆斯林重要圣地之一，现在在伊拉克境内。

已背叛了先知的事业，把伊斯兰教真义传播给群众这一使命必须依赖进步知识分子来承担。<sup>[18]</sup>

沙里亚蒂对教士制度和教士阶层抨击最为深刻的演讲是《阶级倾向的伊斯兰》，这标志着沙里亚蒂对宗教的批判已上升至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来分析宗教作为上层建筑一部分与经济基础之间的有机关系这一高度。他指出，教士故意歪曲、隐瞒、伪造伊斯兰教历史存在必然性，教士们把什叶派伊斯兰教变成了“只注重施舍、慈善、讲究兄弟友爱、父兄和睦和自觉远离奢侈生活”等保守思想也存在一定必然性，因为他们必须获得物质生活。教士们之所以竭尽全力掩盖社会矛盾和穷富差别，是由其阶级属性决定的。他认为，教士阶层与有产阶级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要了解一个人的思想，问问他挣了多少钱便可知。”<sup>[19]</sup>由于这些教士的物质生活来源是教会地产和伊玛目捐献品。<sup>①</sup>反过来，教士必然为这些“物质生活提供者”服务，与这些有钱阶级——国家、地主和巴扎商人密切联系在一起。这种社会关系使教士阶层变成了有产阶级的工具，神学院获得经济支持是为了尽量不涉及到穷人利益，教法学家一套经济理论极力美化佃农制度和剥削乃是因为后者是前者的物质提供者。他们的经济观比资本主义的美国经济理论还要保守，完全出于个人利益因素考虑。他说：“就像在封建时代，伊斯兰教美化地主权力一样，到了资本主义时代，伊斯兰教则美化巴扎商人，教士观念的狭隘和保守，是作为经济基础的巴扎商人狭隘和保守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sup>[19]</sup>他由此得出结论，教士已彻底与保守的巴扎商人为“物质利益”结合在一起，与政治统治者的“权力与利益”结合在一起，伊斯兰教在教士手中不过是谋取“生活资料”的工具，不过是通过美化政治统治者而维护自身“政治地位”，指望这些教士来拯救和解放伊斯兰，焕发伊斯兰生命力，简直是与虎谋皮，能够拯救和解放伊斯兰的力量非“自由知识分子”莫属。

#### 四、结语

沙里亚蒂从阿富汗尼和阿克巴尔等人手中接过伊斯兰现代主义旗帜，继续从伊斯兰教和穆斯林社会的内部寻找落后根源，以拯救和复兴伊斯兰社会和文明为最终文化使命，以对现代社会的发展做出新回应作为内在诉求，在继承他们的思想传统基础上，又极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

从伊斯兰现代主义百余年的思想历程来看，这些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家一直试图从伊斯兰社会内部寻找社会问题的文化、思想和宗教根源，总是把现实社会问题的出现归因于伊斯兰社会、特别是伊斯兰文化受到“不纯洁”思想侵入所致，总是把现实统治者种种“恶行”归因于“早期伊斯兰精神”的丧失或削弱。在他们身上存在一个共同的思想倾向，即这些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总是本能地把目光转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试图从中找到现实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甚至现实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一共同思想倾向决定了这些思想家在对待伊斯兰教时总是一边维护其“精华”，一边要抛弃“糟粕”。这是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想家，从阿富汗尼到阿克巴尔，甚至至今还活跃在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的伊朗著名思想家琐如士，也一直未能彻底克服这一内在思想局限性。应该说，这也是他所倡导的“伊斯兰文艺复兴”和“伊斯兰宗教改革运动”最终难以成功的内在思想根源。事实上，从阿富汗尼慷慨激昂的“破坏”到沙里亚蒂所倡导的“革命”中间相隔已100多年，但传统在伊斯兰世界仍很强大。

尽管如此，沙里亚蒂不仅继承了伊斯兰现代主义一以贯之的社会批判和宗教改革传统，而且从他对传统的批判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以及对伊斯兰革命的实际影响等方面来看，沙里亚蒂已经超越了伊斯兰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阿富汗尼和阿克巴尔，成为继他们之后，伊斯兰世界最著名的思想家。对伊斯兰世界今天的改革思潮来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承上启下的思想人物。沙里亚蒂对伊斯兰现代主义的贡献，以他的“学生”琐如士的评价最为精准：“沙里亚提真正是斯宾诺莎

<sup>①</sup> 清真寺为众伊玛目代收的捐献，包括地产、耕地、牧场等。

意义上的预言家和先知式的人物，一个拥有语言天赋和天才想象力的人，他把伊斯兰变成一种（革命的——译者加）意识形态，这是艾克巴尔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对伊斯兰革命的爆发产生过巨大影响。他对伊斯兰的解说影响了人们对伊斯兰教的态度。”<sup>[20]</sup>（本文得到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博士、伊朗马什哈德大学历史系阿里·佐尔吉先生的语言帮助，谨此致谢。）

#### [ 参考文献 ]

- [1] Ali Shariati: Kavir.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2] 约翰·埃斯波西托. 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M]. 东方晓, 等,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 [3] Ali Shariati. What Is to Be Done [M]. The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Islamic Studies, 1986.
- [4] Ali Shariati. On the Sociology of Islam [M]. Berkeley: Mizan Press, 1979.
- [5] Ali Shariati. A Manifestation of Self-reconstruction and Reform: Muhammad Iqbal.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6] 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M].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2.
- [7] 刘曙雄. 穆斯林诗人哲学家艾克巴尔[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8] Ali Shariati, A Manifestation of Self-reconstruction and Reform: Muhammad Iqbal 以及 Ali' Shiism vs Safavids' Shiism.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9] 艾恺. 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M].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7.
- [10] Ali Shariati. Islam in Tran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11] Ali Shariati. Rise and Bear Witness (I).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12] Ali Shariati. Ali' Shiism vs Safavids' Shiism.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13] Ali Shariati. Man and Islam [M]. Free Islamic Lit. INC, 1981.
- [14] Ali Shariati. The Median School of Islam.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15] Nikki Keddie.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Iran[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16] Ali Shariati. Rise and Bear Witness (II).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17] Ali Shariati. Shiism, the Perfect Party.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18] Ali Shariati. Religion against Religion.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19] Ali Shariati. Class Orientation of Islam. [EB/OL]. [2009-07-01]. www.shariati.com.
- [20] 米歇尔·雷曾伯格. 启蒙运动与伊斯兰哲学——伊朗当代思想家琐如士访谈[J]. 王泽壮, 译. 西亚非洲, 2008 (12).

## Ali Shariati's Contributions to the Islamic Modernism

WANG Zezhuang

**Abstracts** One of the three major ideologues of the Iranian Islamic Revolution, Ali Shariati, praised as *the Father of the Mujahedin Guerrilla*, did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Islamic modernism by absorbing and developing the intellectual heritage of Afghani and Eqbal, as well as Western thoughts such as Marxism and Existentialism.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rgues that Ali Shariati wa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ker since the commencement of Islamic Modernism initiated by the two precedents.

**Key Words** Ali Shariati's Islamic Ideology; Islamic Modernism; Afghani; Eqbal; Islamic Thoughts

（责任编辑：李 意）